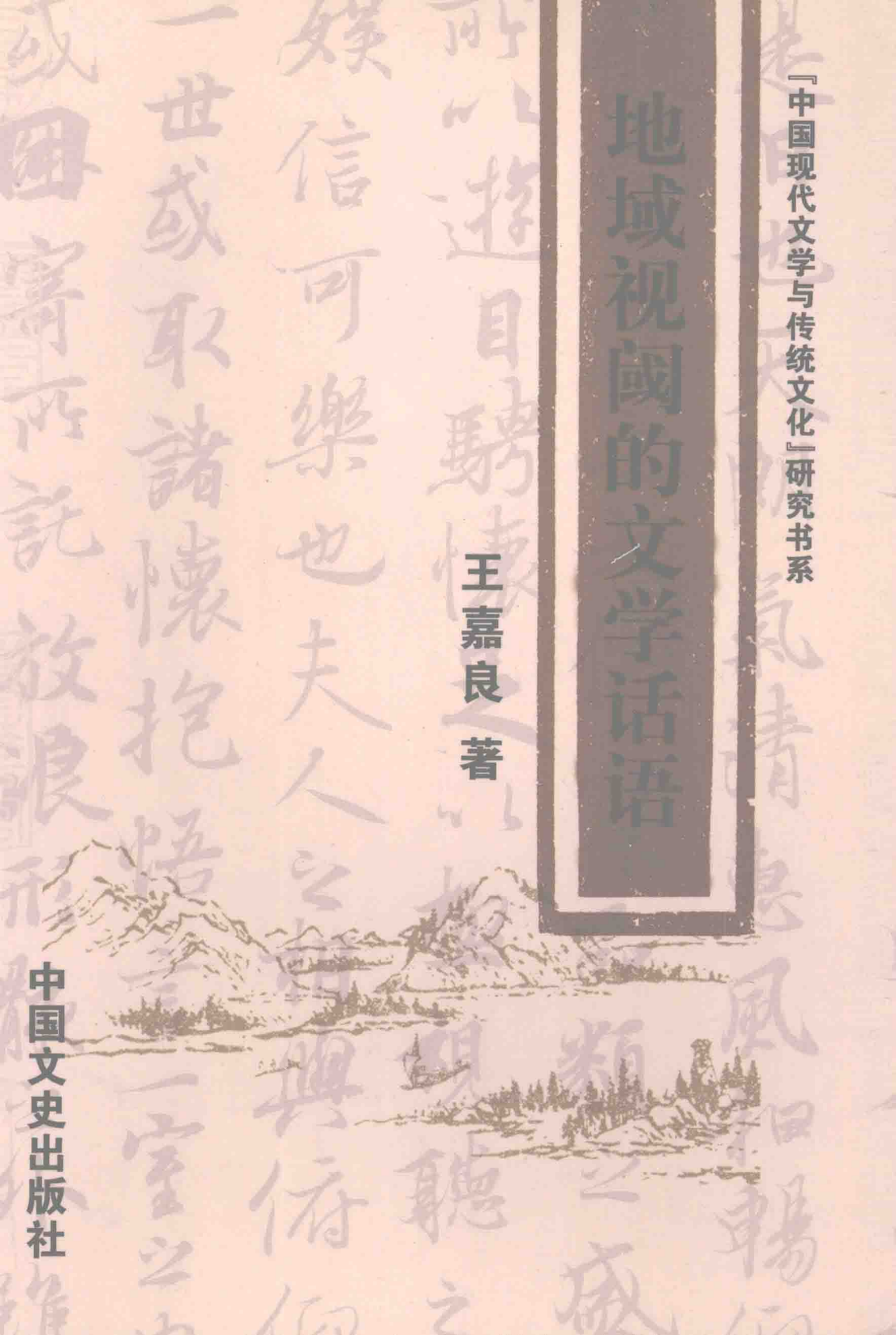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书系

地域视阈的文学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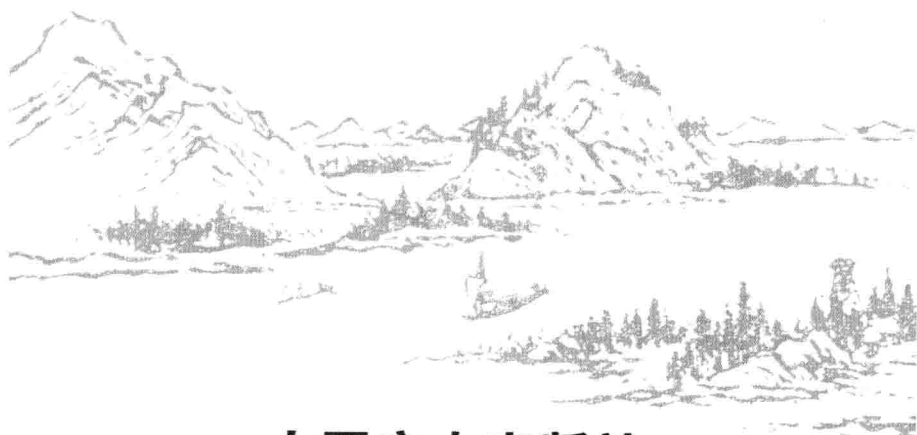
王嘉良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地域视阈的文学话语

王嘉良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域视阈的文学话语/王嘉良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7.8

(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书系. 第1辑/王嘉良 高玉主编)

ISBN 978-7-5034-2004-7

I. 地… II. 王…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3065 号

责任编辑: 张蕊燕

封面设计: 卢心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刷: 金东彩印厂

邮编: 321035

装 订: 金东彩印厂

邮编: 321035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21.75 字数: 334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 172.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书系编辑例言

一、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为浙江省高校重点学科，也是全省现当代文学学科中唯一的一个省级重点学科。2005年10月，浙江省在原有100个省级重点学科(A类)中选择10个文科学科作为“重中之重”建设成10个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浙江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为基础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经申报入选。嗣后，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部门又组建一批全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的“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经申报被批准为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本学科是该基地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研究基地的设置，进一步整合了研究力量，旨在加大科研力度，以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协力完成重大科研项目，为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为推动浙江文化大省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书系是基地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批系列研究成果，既以展示本基地和学科成员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以此促进同行间的学术交流，使基地在日后的建设中取得长足进展。

二、本书系所选各本著作，均为本基地成员的论文结集。文

集入选原则,一是入选者要有较丰富的学术成果支撑,使入选文集体现较高学术水平;二是书系各集涵盖基地和学科的各个研究方向,以全面反映本基地和学科的整体学术水平。各文集选文,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命题,并冠以恰当书名。所选文章以近期发表的论文为重,尽可能收入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文末注明论文发表的刊物名称及被转载的重要刊物(如《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名称。每本论文集字数约30万字左右,对论文作适当归类编排,每种类型设计一个小标题,在目录和文集中显示。

三、本书系暂编为一、二辑出版,每辑基本按学科成员的不同研究方向编排。人文社科基地在“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总体研究范围内设有五个研究方向:两浙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学思潮与文学批评、儿童文学研究、传记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的今古承传演变研究。书系的第一辑为前两个研究方向的论著,第二辑则为后三个研究方向论著。

四、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书系,是展示、检阅研究基地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式,在基地建设期间,这套书系将继续陆续出版,并使其日臻完善。今后出版的论著,将以学术专著为重,酌收适当有分量的学术论文集。

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

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目 录

第一编 论新文学“浙江潮”

论“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3

启蒙语境中的乡土言说/19

——论浙东乡土作家群

地域文化视野中的左翼话语/35

——论浙东左翼作家群

“面海中国”地域的文化冲击波/49

——“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潮

开拓与创造：地域文化精神的生动张扬/61

——论“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功

聚焦文学：《新青年》中浙江作家群凸现的意义/73

引领新潮：浙江作家群领衔新文学流派的意义/83

“浙江潮”与“五四”新文学运动/93

战时东南文艺运动之历史描述与评估/105

论战时东南文艺运动中的“浙江潮”/117

风云际会 历史遇合/129

——战时东南文化运动成因探析

第二编 作家的文化溯源

论中国新文学“浙军”的文化承传/141

两浙文化传统:鲁迅文化人格形成的内源性因素/153

两浙人文传统:中国新文学巨匠茅盾的内源性文化承传/165

论茅盾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定位/175

经济视角:文学对“社会”的深层透视/185

——论茅盾创作的现实主义范型特色及其当代意义

“茅盾传统”:值得深入讨论的历史命题/196

战时东南文艺的一面耀眼旗帜/206

——评说王西彦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成就

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216

——为纪念柔石百年诞辰作

第三编 地域文学与文学思潮

民俗风情:透视“乡土中国”的生存本貌/225

——“民俗文化”视阈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文学的诗意栖居与坚硬的“土性”呈示/237

——中国现代文学“风俗画”的两种范型

论语丝派散文/247

略说“京派”与“京派作家”萧乾/267

晚明小品与语丝文体:古今散文的传承与流变/276

从形态论切入:现实主义研究的可取视角/286

——中国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形态论纲

文学思潮视野中的启蒙话题/297

——论“五四文学”的启蒙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社会批判”传统及其当代意义/308

人道为本:文学认知与表现人的深层拓进/320

——论中国新文学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

灵魂的写实:突进创作主体的深层心理体验/331

——论中国新文学的心理体验现实主义

后记/342

第一编
论新文学『浙江潮』

论“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

在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整体背景上,曾凸现一种声势壮阔的“浙江潮”文学奇观:阵容整齐的新文学“浙军”起自东海之滨、钱江两岸,稳稳地洒向全国、走向世界,占据中国新文学的各路要津,或成为新文学的开创者、奠基人,或成为一种文体、一个流派的开拓者或代表人物。如此盛况,其它地域无出其右。这是一种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曾有学者指出,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可注意抓取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切入口”,例如群星灿烂的五四文学时期,“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就很值得研究者去思考和探索^①。此说甚是。探讨中国新文学的“浙江潮”现象,其意义不只是在揭橥地域文学经验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可以藉此在地域与整体的互动关系中探寻于中国新文学发展规律极具观照意义的东西。其中从新文学初创期“浙江潮”波澜壮阔的涌动中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便是颇有意义的话题。

以文学的生成机制视之,中国文学从 20 世纪初逐渐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建构呈示“现代”新质的“新文学”,应该具有多种复杂的因素。以往人们谈论较多的“外来影响”论或“挑战—回应”式的中西文化碰撞论

^①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显然都触及了新文学的源起因素,但似乎很少谈到“传统内部”的新质储备构成对旧文学的冲击作用,从而产生又一重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这或许是由于在 20 世纪的世界文学背景上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参照意义十分抢眼,促使人们纷纷把目光移向“外来”;或许是由于中国文学传统中可资探寻的“新质”资源太弱,遮蔽了人们对此的搜索视线。事实上,任何一场文学革命或文学运动的发生,都是外来因素与内部结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中国产生的这一场亘古未有的新文学革命若首先不是基于其自身的变革要求同样是不可思议的。20 世纪初崛起并迅速抢占中国新文学制高点的“浙江潮”文学现象的意义就在于:它以中国一个特殊地域长期累积的文学传统的生动张扬,显示了中国文学中有一种同儒家传统相对的同样也是“强而有力”的充满“内在的张力”的传统^①,它以丰厚的文学资源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证明了中国新文学中的反传统并以此建构一种新的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的传统根源”。

不必详尽缕述“浙江潮”在建构中国新文学过程中的显赫地位与作用,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一股文学潮以挺立潮头的姿态引领中国文学新潮的意义,而这并不困难。至少在下述两个层面上可以集中显示出“浙江潮”作为新质储备在新文学“发生”中的作用。

其一是在新文学“前夜的涌动”期,“浙江潮”便以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显现着勇决的“叛道”传统与敏于新变的精神。新文学产生的“前夜”,处在新旧世纪之交、新旧文学激战的间隙,“表面是平静的”,但“海底里”却汹涌着“各种激流”^②。这当中,文学“浙江潮”的崛起,便形成一种夺目景观。个中的翘楚者便有章太炎、秋瑾、蔡元培、王国维、鲁迅、周作人等。这一在“前夜”期涌出的浙江先驱者群体,其意义首先也在于以他们对文化新潮的敏锐感知,已开始向文学的“现代”方向发起强有力的冲击。其中表现文学先导性思想最突出的,是被郭沫若并称为中国 20 世纪的“两位大师”、“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的鲁迅与王国维^③。这一对恰好出自浙江的文化“双璧”,以惊人的才华显示了浙江文化人的深厚底蕴。王国维是近代以来系统引进西方美学和文学观念在中国建构“纯文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同时也是作为“世纪初的一个非理性的、人本话语的言说者”开启了

①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 28 页、第 1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程文超著《涌动的前夜》第 1 页、第 172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 12 卷第 53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中国新文学的“另一思想源头”^①；斯人之出，标志着我国于古今、中西之间徘徊不前的近代文艺思潮已加速了向“现代”迈进的步伐。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其更重要的业绩是在“五四”以后，然而其在“前夜”期对文学革命的深邃思考同样引人注目：他在其时已系统提出“立人”思想，认为“二十世纪之新精神”就在于崇尚“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②，实开其后五四新文化思潮之先声；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以此为准则看出了“前夜文学”改革的不彻底性，痛感“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热切呼唤“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③，这实际上已在殷切期盼一场新的文化、文学革命早早到来。从这里见出的正是浙江作家对于开启新文化和新文学所独具的智慧与眼光。

其二是在新文学革命中“浙军”的异军突起，显示出“浙江潮”引领中国文化新潮的显赫声势。这当中，浙江作家群在新文学舞台上汇聚整体的精彩出演也许依然是最显眼的。“新文化运动倡导势力自一刊一校的革新力量集结起来形成了自我势力”^④。此语不虚。所谓“一刊一校”，即《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这两处正因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新文化群体，集结了一批志在革新的新文化精锐，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新文化思想的集散地。浙江作家在“一刊一校”中参与人数之众和所处位置之显要，就十分突出。先后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的浙江作家有钱玄同、沈尹默、鲁迅、周作人，几占当时最知名的《新青年》同人一半的份额；而且正是浙江作家在《新青年》发表作品数量之多和影响之大，他们遂成为“《新青年》作家群”中一部分最有成就的作家。北大校长蔡元培是浙江人，其作为北大这个新文化中心的一面旗帜，无形之中加重了浙人在领导新文化潮流中的分量。而且，北京大学也是浙江学人和浙江作家集结之所，特别是“革新力量”之多甚为瞩目：除周氏兄弟（树人、作人）、钱玄同外，还有颇具声望的沈氏兄弟和马氏兄弟，即“三沈”（沈尹默、沈远士、沈兼士）、“三马”（马裕藻、马衡、马廉）等。这个现象直至20年代中期还不时被人提起，称之为“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⑤。所谓“某籍”，即浙江籍；

① 程文超著《涌动的前夜》第172页。

②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

③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6页。

④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第19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⑤ 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1卷第25期。

“某系”，即北大中文系。于是就有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是浙江人专权^①之说。自然，这还只是一些表象，更实质的内涵是在于：浙江作家以其先导性思想对新文化运动施加了深层影响，他们固有的“叛道”传统和敏于新变的精神使他们在场新的文学革命到来之际立即显示出开拓新路的潜能，他们在迅速完成文学的现代性转换后在中国新文学的源起中起了切切实实的引领作用。其影响最为卓著的，当首推周氏兄弟。鲁迅以其敏锐的思想家眼光和积淀深厚的艺术家素养把握新文学方向，其文学观念进一步融通 20 世纪世界文化新潮，构成对封建意识形态和旧文学的整体性批判，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在创作上则发出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声“呐喊”；周作人同样有文学革命的首创者之功，其提出的“人的文学”的口号，为新文学树立了标的，赋予新文学以实质性内涵，诚如罗家伦在其时就指出的，周作人之论出，才使文学革命真正落到了实处，“今后的新文学，应该是周作人所说的‘人的文学’”^②。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之于此两位浙江作家的意义，就在于确立了他们作为毋庸置疑的中国新文学的伟大奠基者和开拓者的地位。

上述匆匆巡视，已大略可见中国 20 世纪初发生在浙江这片神奇土地上的文学“神话”。这的确是个奇迹：因为在一个并不太长的历史间隙里和一块并不开阔的地域范围内（在全国的版图上浙江还是最小的省份之一），走出了那么多文学精英，他们熙熙攘攘挤到中国文学的前台，演出了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怎么说都足够令人惊奇的。探讨这一文学现象的成因，也许又是个挺复杂的话题，但有一点似乎又很清楚：积累如此丰厚的文学库藏，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以如此超常的现代意识观念推动中国文学新潮，显示了充足的“新质”力量对中国新文学的热切呼唤，则又证明了此地的确潜存着一种为别的地域所不具备或表现不充分的优秀文学传统。

论说浙江的文学传统，当然可以推衍到“远传统”：20 世纪初浙江文化新军的聚集，可能由这个区域文化场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致。在越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自古以来就不乏自强不息、耻为人后的精神。鲁迅所说的“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

①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 343 页，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 1980 年版。

② 转引自李景彬著《周作人评析》第 56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才”^①，便是对这一特质的精当概括。是故这里英雄豪杰，生生不息；文人学士，绵绵无绝。然而，在 20 世纪初的文化大潮中，这里突发性地孕生出一支壮观的文学队伍，“善生俊异”的特点一下子表现得那么集中、突出，却不是笼统的“历史”两字可以一言以蔽之的。传统作为一种历史的“物质积存”，它是“几经筛选”才为人们接受的，因此“传统的进程也是选择的过程”^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从“远古”的影响寻觅传统的踪迹未免太过渺茫，重要的是要考量现代人在“传统的进程”中对其作出现代性的“选择”。中国晚近的文化历史证明，中国的“传统内部”的确潜滋暗长着“从旧的因素中创造出新体系”的痕迹。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中国自近代海禁大开以来，一直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传统，即“面海的中国”的“小传统”和“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腹地”的“大传统”，前者表现为先进的“城市—海上的思想”，后者则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文化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两者必构成尖锐冲突；在冲突中富有变革精神的“小传统”渐次获得生机，其释放的巨大能量日益改变着被“支配”的角色定位，而日渐由“边缘”向“中心”位移^③。此说精当地概括了中国文化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传统内部结构的变化，这用来说明浙江文化传统的近现代进程颇有启迪。浙江作为“面海的中国”的一部分，能够在 19、20 世纪之交中西文化大冲撞之际得风气之先，率先经受近代文明思潮的洗礼，便源于这一块根基厚实而又敏于新变的文化土壤，而“小传统”的日积月累已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中国的文化新潮，当是其更内在的原因。虽说浙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但其文化发达景状达到领先全国的优势却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演进的。“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这一人们对东南、江浙地区文化发达的赞语，便是宋明以来此地经济与文化相谐发展的层面上作出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面海”的浙江才有可能主导文化新潮。宋明开启的鼓吹思想启蒙、抗逆封建礼教的两浙人文传统是其先导，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实际上已影响和主导了当时的思想文化潮流。梁启超就认为，出于浙东的“残明遗献思想”已处在当时的“文化中心”地位，其影响所及直成为促成近代“思想界的变迁”的“最初的原

① 鲁迅：《〈越铎〉出世辞》，《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39 页。

② [美] E·希尔斯著《论传统》第 3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费正清：《作为小传统的面海的中国》，《剑桥中华民国史》第 11-15 页。

动力”^①。近代以来,此地启蒙文学一直呈持续发展态势,内中不乏倡言变革、“迥绝辈流”^②的诗文大家,而作为封建“衰世”的批判者和改革风雷的呼唤者的龚自珍,更是从浙江走出的第一流启蒙文学大师。其思想学识不独流布甚广,“风尚所趋,尊为‘龚学’……家弦户诵,遍于江浙”^③,且以其振聋发聩的“改革”呼声直接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界、文学界。梁启超即谓:“并世诸贤,其能为今之思想界放光芒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把后来“浙江潮”的涌动,看成是一种历史传统的承续,是“小传统”的一种蓄势已久的喷发,恐怕是不会太勉强的。事实上,这并非揣度,却是有例可证的:20世纪初的新一代浙江学人勇攀潮流,是多少受到“乡先贤”召唤的。面对“二十世纪之大风潮”来临,《浙江潮》的同人曾有如此激昂的发问:

乃读乡先贤哲学士大夫之遗书,其理想之高超,出乎天,天而入于人,人发为章,云蒸霞蔚,光怪陆离,我浙人以干政治界、哲学界、文艺界,其位置固何等乎?……且将挾其一切哲理、一切艺术,乘此滚滚汨汨飞沙走石二十世纪之潮流,以与世界之文明相激射相交换相融和,放一重五光十色之异彩,以灌溉我二十一行省之同胞。浙江省文明之中心点也,吾浙人果能担任其此言乎,抑将力不能胜任,徒为历史羞乎?”^⑤

这里所说的“乡先贤”当指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等光耀于世的浙籍文化先驱;以文化先驱自励,以浙江曾是文明“中心点”自策,表露的正是新一代浙江人在先哲的召唤下油然而生的一种“天降大任”的紧迫使命感。由是不难理解,世纪之初新文学潮涌动时浙江人会如此率先“抢滩”,“浙江潮”的崛起会以如此壮阔的声势展开;也不难理解。浙江的新文学先驱者群体在叛逆道统、实现思想启蒙上同他们的前辈有那么多精神上的联系,以至不难在两者之间一一找到对应。不妨说,带着一种对于优秀传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2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朱琦评姚燮语,《复庄诗词》卷首题词。姚燮(1805—1864)是近代浙江著名诗人。

③ 王文濡:《龚定庵全集序》,世界书局1935年版。

④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第97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⑤ 公猛:《浙江文明之概观》,《浙江潮》第1期。

统的自觉的接受意识和固有的叛逆传统精神的生动张扬，应是浙江人紧紧抓住新世纪到来的机运作一次激越而悲壮出演的原动力之一。诚如鲁迅在世纪初写出的《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指出的：“匡救”中国的“明哲之士”，应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新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这种对“固有血脉”如同对“世界新潮”一般的自觉认同，正可以看出浙江新文学先驱者对两种文化传统的同样关注，也昭示着新文学形成的两种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作为滋生“小传统”地域的浙江在 20 世纪初中国固有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一次集中展示，恰恰印证了下述“断言”无可争辩的正确性：“在现代中国，国外鼓动的革新仍必须作为‘传统内的变化’而出现。因为即使与传统最惊人的决裂，仍然是在继承下来的中国方式和环境的日常连续统一体中发生的”^①。

二

作为推动新文学生成的一种“传统内”新质力量的集聚与展示，“面海”的浙江人所固有的文化精神：外向拓展意识的尽情展露，是其重要表征。当世纪初异域新风袭来时，浙江人有一种敏锐的感知，欲“与世界之文明相激射相交换相融和”，于是才有“浙江潮”勇迎世界文化新潮的壮观景象，浙江文化新军在中西文化交融中方大有可为。这当是我们考察中国新文学发生缘由的又一个切入点。探讨中国新文学的源起，不可不说外源性因素，因为它毕竟是在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背景上发生的，且其明显是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交融的产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此作内源性思考。需要提出的是，两种文化的交融是通过怎样的途经达成的？此种交融是否也有着特殊的地域关系？“浙江潮”崛起在“面海的中国”的事实，说明了唯其有“小传统”地域一种传统精神的生动张扬，方才有外向拓展、勇迎潮流的眼光和气派；同时也说明了唯其有内外感应的文化共振，方才有两种文化水到渠成的交融，新文学的源起同“传统内”固有素质的积累依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两种文化的交融，往往首先取决于文化接受者有否吐纳异质文化的胸襟与姿态，因为这常常是一种文化能否容忍、呼应另一种文化“冲击”的

^①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前提。“小传统”地域的浙江文化之富有生气,就在于其善于接纳异质文化的态度也是历史积淀的一种传统,它恰好同以儒家为正统的“大传统”长期以来形成固守一隅的封闭的文化心态相对。由这一特性所规定,其对外来文化的介入,便有一种主动迎受的态势。从而在内外感应中达到两种文化的交融。

从深处看,浙江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特质是流动性与开放性。这是由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养成的独特品性。浙江地处海隅,省内河道密布,对内对外交通都十分便捷,所谓“百粤三吴一苇通”的温州是如此,其余各地也大致无异;又加此地经济繁荣,“越子俗好贾”^①,杭人“习俗浮薄,趋利而逐末,顾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②,这种不重“儒业”而重商贾的习俗必造成好动善变的性格和乐于外向拓展、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即便文人士,也大抵不失好动的习性:浙江人“子弟胜衣能文词,父兄相与言,命束装负书,以行四方”^③,是对此的生动写照。是故这里常常是“四方游士”的集散之所,文士交游异常活跃:“自元裙以来,士气浸盛。……涵养停蓄,波澜日肆。至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④。这种历史积淀的地缘文化性格显然是浙江人具备外向拓展意识的文化基因与心理基因,此种基因遇合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机,便会得到加倍张扬,并有可能在外向拓展中获得文化交融的某种先机;同时因文化接受呈示主动迎受态势,就不可能是被动的“输入—接受”模式,两种文化的融通也会有较好的良性互动关系。明清之际的一次中西文化交流中,浙江便有过出色的预演。当时大批西方传教士经海路登陆中国,地处东南沿海且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浙江便成了一个主要传教区。由于其时中国国力尚盛,中国人充满哲人智慧与道德和谐的文化也令西方人景仰,故当时主要是“和平传教”,中国人受“教”也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对于“西学”有所选择的吸收。西方传教士以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主要载体,输入欧西科学、哲学思潮,这对于当时有眼光的中国士人而言,显然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富有文化开放精神的浙江士人主要是在这一层面上接受了宗教,于是便有一种主动迎受的态势。据史料记载,当时在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上层社会人士

①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七《贾说》。

② 周淞:《乾道临安志》“风俗”条。

③ 袁桷:《送周子敬序》,《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三。

④ 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二十九。